



《安德的游戏》：少年领袖难做快乐孩子

新片点击

□无端

《安德的游戏》很难拍，因为它的原著太棒！这部由美国科幻小说家奥森·斯科特·卡特完成于1985年的作品曾获得星云奖及雨果奖。其续集《死者的代言人》也轻松突破“珠玉在前，难免狗尾续貂”的魔咒，再获星云奖和雨果奖，这在科幻小说界也是鲜见的佳话了。因为科幻，所以可以天马行空。在未来世界中，人类承受不了虫族的进攻，死亡无数。由于小孩在吸收信息、操作电脑和随机应变方面都比成人高明，所以负责地球安保的国际舰队顺着“对抗虫族，从娃娃抓起”的思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天资聪颖的孩童，将他们集中于“战斗学校”，努力塑造他们成为军事奇才，以保人类平安。

虫族还不曾入侵，“战斗”却已经打响。“战斗学校”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从那些少年人青涩稚嫩的脸庞上你基本看不到正常孩子天真、爽朗、明媚、愉快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肃穆、阴冷、眉宇间充满了莫名的仇视和欲望。事实上，这些“战斗指挥官预备队员们”不可能在如此目的鲜明的培训中不对自我进行强烈心理暗示：要强！要胜利！要打败除自己外的所有人！被选中到位于外太空训练站进行培训的安德·维京和所有孩子一样，知道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中，只有一人才能成为对抗虫族的领袖。这个孩子将实现那位国际舰队中上校的期盼：你要成为拿破仑！凯撒！——这种激励多少带有点“超道德”的意味。

那批孩子在“战斗学校”所接受的魔鬼训练极易令人联想到现实教育中同样存在的弊端。教导孩子求胜、求赢，却忽视了“关爱”、“互助”等更为温暖的引导。在优秀奇幻少儿电影《雨果》中扮演过小主人公的童星阿沙·巴特菲尔德这次饰演的少年安德·维京表现依然出彩。一双清澈的眸子深邃幽蓝，在特写镜头前显得非常漂亮，展现给了观众一个天才少年的犀利，同时还有和其年龄并不相符的另一面。影片开头部分，安德·维京和一个不服输的胖少年较量，安德接受挑战时表现得勇敢而自信。可接下来的那场斗殴，过于血腥，两个孩子就像两头发狂的小兽。尤其

是安德，在已经彻底击败对方的前提下，还在狠命地踹啊踹……导演当然想展现：只有经受过各种残酷磨练的孩子才能成就大事业。但笔者看到的却是时刻灌输着的战争危机教育正在潜移默化中“改良”孩子们的淳朴天性。事实上，孩子本身也很痛苦——在至亲的姐姐面前，安德·维京眼含热泪……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此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少年领袖一步步成长，最终达到堪当大任、完成光荣使命的过程。英雄的长成从来不是平步青云式的，影片很强调该过程的曲折。安德要接受外部的体能、智力等各方面挑战，还有心理的折磨与砥砺（这一点在原著中有细腻描写，影片中鉴于难以进行直观表现，有所弱化），用中国古话来形容的话，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方面，安德具有善于体察人性的特长；另一方面，他也在渐渐丧失着一个孩子本应有的单纯美好。比如有一次，安德在零重力空间内看见上校先生整个身体飘浮着就进了舱。他条件反射般觉得新奇、好玩，忍不住嬉笑。可一发现上校瞪眼，便瞬间恢复了正襟危坐的状态，表情也归于严肃深沉。这个细节将主人公天性里的童真和他在重压之下必须保持的隐忍意志进行了一次小小拉锯，很值得玩味。

据说有观众不喜欢结尾处小主人公在情感上的突兀转折。不过笔者倒是很欣赏这个段落。安德用自己的才华彻底消灭虫族外患时，显露出了点“背叛人类”的意味。他竟然独自一人去和虫族交流，这多少叫观众在情感上有些接受不了——你是人类，怎么可以这样没有阵营观呢？可是，影院中，同样也有不少人在安德将虫族的母星炸毁，眼中闪着泪花说“不做残忍的人”时感到动容。我觉得这个节点可以被看作是安德一系列战斗行为终结后的全新救赎起点。作为一个拯救地球的英雄，他的眼泪恰恰证明了他不是个简单的战争符号，不是个死板的胜利代言人。他在完成使命后的情感摇摆显得异常真实、动人。同样是在影片的结尾，导演给了这个“残忍”的孩子一个小小“惩罚”——安德将终生不可能重返地球，再见亲人。他只能带上被他一手灭族的虫族遗留在宇宙中的最后一枚虫卵，在宇宙中旅行，并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和思索……

视角分享

《警察故事2013》：舞台模式下的亲情

□思路

成龙老了，《警察故事2013》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系列电影，成龙已经成功主演了6部。从1985自己导演的《警察故事》到后来几乎每年推出一部，共推出4部“警察故事”，再到2004年的《新警察故事》，其实内容没有多少变化，都是成龙的功夫、枪战和简单的警匪逻辑。说成龙老的是因为，这一次，他不再是导演，只是安安静静地当好一个演员。就算在演员群里，他也不是锋芒毕露的那位。他高调的幽默和用功夫吸引眼球的渴望变得不复存在，仅剩下一个老实巴交的内核，诚恳地等待人们的评价。

而刘桦和景甜，大有喧宾夺主的嫌疑，他们几乎都用力过猛，试图丰满自己的角色，也大有超过“大哥”的野心。刘桦的“狠”劲儿表现在利落的行动和海明威式短而有力的说话节奏上，景甜的改变则来自化妆前后（即叛逆女和乖乖女）的变化，和对亲情的诠释。她与成龙成功搭戏，成龙的稳重得到进一步体现，景甜也在这部戏中成熟了不少。她饰演的护士，在柔弱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比她年龄更为成熟的心。

成龙在这部电影中变得异常温柔，不再莽撞，却也表现出了一位老戏骨应有的素质：用抬爱年轻演员的方式成全自己。

《警察故事2013》是2013年最后一部“警匪片”了。警察系列和成龙，因为这6部电影，成了华语电影史上与“黄飞鸿”系列、“古惑仔”系列、“倩女幽魂”系列齐名的、运作最成功的系列电影之一。

与以往几部警匪片不同，《警察故事2013》看着更像一部舞台剧。电影中的绝大部分场景，都锁定在那个布满阴森气息的“武吧”里。表面上，那里是热闹都市的缩影：那里有灯红酒绿，有排遣寂寞之人，也有寻找自我的人。当那个本可以放纵自己的“真空区”变成活生生的监狱之后，那里的人们表现出了整个人性的宽度和厚度。让矛盾集聚到一起突然爆发，是包括话剧在内的舞台剧常用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被《警察故事2013》的导演丁晟运用自如。从这一点而言，《警察故事2013》有它的创新。更大的创新则来自对武汉妹妹死因的阐述。四五个人“罗生门”式的阐述相互补台，让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在大师黑泽明的成名作《罗生门》中，也采用了这样的叙述模式，只是电影中的几个人相互拆台，让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警察故事2013》的亮点不再是警匪故事，也不是枪战和武打，它用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吸引人，所有一切，包括演员阵容，都为这一新颖的叙事模式服务。

在《警察故事2013》近乎残酷的搏斗背后，隐藏了两段亲情和一个原谅：第一条线索为景甜和成龙的父女情。这一系列中，通过一次激烈的矛盾，女儿终于体会到亲情的伟大和父爱的无私。第二条线索为武汉与他妹妹的兄妹情。武汉的妹妹在电影中几乎没有出现。电影中的人们用圆形的叙事模式讲出了他们的亲情，因为并非线性叙述，其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展露无遗。一个原谅来自钟文和武汉。在残酷的环境下长大的武汉，终于明白那个作为父亲和警察的男人身上肩负的责任有多重要。当然，这样的结尾有一点老套，但两个男人原谅彼此的瞬间，甚至比父女之间的原谅还要动人。

投稿邮箱：jz@cmb.com.cn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脉自杀。那个揭发他的朋友正从窗前走过，发现情况不对，与别人一起破门而入，把叔叔送到医院。抢救回来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脉，又被抢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脉。

当时我写给他的求援信，他没有收到。几天后，他们单位通知了我家。妈妈和祖母决定瞒过我们下一代，两个人坐火车去料理后事。

祖母怔怔地看着自己最小儿子的遗体，又横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拉了拉妈妈的手，要她别再哭下去。

没有人理她们，在一片冷脸中操持完火葬事务，妈妈捧着叔叔的骨灰盒，与祖母一起走在寒风凛冽的江淮平原上。祖母脸色木然地看着路边的萑草荒村，心想，这就是他的土地。老娘我夜夜做梦都在猜测这片土地的模样，猜测他不愿离开的理由。现在，终于离开了，还是跟着娘。祖母对妈妈说：“让我捧一会儿吧。”

妈妈犹豫了一下，恭恭敬敬地把骨灰盒递到祖母手上。祖母抱过后停住了脚步，对妈妈说：“你看我这个女人，

一辈子都在送走一个儿女，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捧在手上了……”

“姆妈！”妈妈轻轻叫一声，双手扶住了她。祖母还是无泪。她说：“现在只剩下志敬一个了，千万要让他活下来。”

她们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后，她们从车窗里看到，有一个男人慌忙从月台上跑过来，看着这趟列车，双手拍了一下腿。

祖母说：“这个人很像江斯达，他怎么会这样老了？”

“江斯达？”妈妈问：“他跑来干什么？”

后来马兰听我讲叔叔在安徽自杀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觉得，应该为叔叔做点事。

“他太孤独了。”马兰说：“这片土地不应该这么对待他。”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隆重首演，产生爆炸般的轰动效应。这出戏获得了全国所有的戏剧最高奖项，在海内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时都卷起了旋风。

全剧最后一幕，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每场演出都是这样。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计失去了最后一个希望。

祖母与妈妈一起，想到爸爸单位去，要求他们看在全

家要活下去的份上，多发一点生活费。但她们一去，正遇上批斗爸爸的群众大会。

她们从门缝里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个正在发言的批判者推了一个踉跄，台下所有的人都畅怀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们，笑得最开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气鼓鼓地对妈妈说。这是她一生用过的最坏词汇，是从老戏里看来的。她说：“这几个老朋友，明知我们全家有那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

我听妈妈说了这个过程，觉得申请增加生活费的事，应该由我来做。

我打听了一下，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百般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两位来往较多的中学老同学。他们说，曹老师的那个“红署造反派”地位太低，领导他们的最高司令部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如果疏通了关系，可能与“工总司”说得上话，帮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几元生活费。

我想到中学里还有一位不同班的张姓同学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可以找到他问问看，认识不认识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领。当时这些首领，其实也是学生。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